

《世界如此危机》 连载(二十四)

高连奎 / 文

中国改革不分“左右”,只分“好坏”

中国改革不应该分“左右”,而只应分“好坏”。

在明确中国改革的好坏之前,我们非常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明确了目的,才会树立正确的目标,有了目标才会不走错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口号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口号务实,但经济发展了,民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因此积累了很多的社会矛盾。

中国现在提出,“要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我认为是对中国发展路线的进一步修正,“要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也应该成为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纲领性思想。

但政府的思想很难成为“学者的思想”,因为学者的思想受教科书影响很大,他们的观念是先入为主的,比如,中央提出改善民生很多年了,但笔者翻看吴敬琏的文章,发现他几乎从不提“民生”一词,而是反复提他的市场化,他还是坚持要建立一个市场丛林社会。

房地产是市场化了,但是民众住不起房了,这样的改革符合市场化,但是不符合民众利益,这就是“坏改革”,如果中国政府通过保障房建设,实现了“居者有其屋”,那尽管政府干预了市场,那这样的改革是“好改革”。归根到底还是要明确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在改革开放初期,奠定中国发展的是两次非常重要的大讨论,一次发生在政治领域,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另外一次发生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同样重要,但只有经济学界的人才比较熟悉。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的结果是重点发展轻工业,从而更好地改善民生,当然与此对应的是很多重工业项目下马,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轻工业,改善民众的生活,中国改革开放后民众生活水平突然提高,就是这次大讨论之后中国转变经济政策的结果。

但笔者并非认为这场讨论是完全正确的,其实放弃重工业也是不对的,但其大力发展轻工业的思想在当时是合适宜的。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在建立一个新思维的时候,不能完全放弃旧的东西,这样中国才不会总在左右之间摇摆,而是实现帕累托改进,其实中国当前改革的转向并没有多少反市场的地方,而是更多地承担了政府本就应该承担的职能而已。“小政府”不是好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才是好政府,中国现在就是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当人的思维陷入某种骗局之后,只有残酷的现实才能让他们警醒,而且即使警醒,他们仍然存在疑惑,这就像魔术一样,人们都知道魔术是骗人的,但是在没有揭开背后的实质之前,观众心中总是充满疑问。

在中国恶经济学家是有帮凶的,这就是信奉多党民主的人,他们天真地以为市场派经济学家是民主的天然盟友,但他们不知道这些经济学家信奉的是精英治理,而不是民主,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都是反民主的,哈耶克就是典型,我们必须看清楚,民主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不对立,而追求民主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什么服务都没有的小政府。

改革本身就是辩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让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改革,谁也没有指定中国改革一定就是照搬美国模式,况且美国也在改革中。

另外中国学者一直使用“国有、民营”这样的二分法来看问题,而实质是“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分天下。外资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做的是大胆地与外资抢地盘,而不是觊觎着到那三五个自然垄断性行业去捞金。

当前中国如果要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除了要预防美国的金融洗劫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产业上发力,拉美、东南亚不少经济体没有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殖民地经济模式”,仆人的收入永远超不过主人,打工仔的工资不可能超过老板,看不透这一点,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很难。

笔者近日阅读《中国财富圈》一书,该书从中国富豪俱乐部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商业生态,阅读中,笔者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深圳并没有非常知名的富豪俱乐部,其次在这些俱乐部中丝毫看不到金融高管和科技精英的影子,其原因是深圳大多是金融和高科技企业,两个行业都很忙,没什么闲工夫搞这些富豪俱乐部,大家什么时候看到任正非游走于各种论坛和富豪俱乐部呢?但只有华为这样的企业才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学者需要先锋学者,而不需要极端学者,极端学者大多是知识太少的缘故。中国

需要以公共利益为准绳来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不需要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部分学者在政治上主张精英治理,反对民主;在民生上主张市场原教旨的小政府主义,反对公共服务型政府;他们不断地炮制新说,或是威胁恐吓,这在一定时期是有用的,但是林肯的一句名言可以做出解释: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中国改革的阻力与动力

按道理说,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制造问题,但现在并非如此,现实很多指导改革的人,往往并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主义出发,从利益出发。

改革有阻力,更有动力,改革的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团,改革的动力则是将得利益集团,改革本身不是利益的分配,也不完全是利益的分配,但是帕累托改革几乎不存在,因此改革必然伴随着利益分配,而且是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因此必然会出现改革的受益者和受损者。

国企改革是正确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房地产改革则是制造出的问题,远远大于解决的问题,这就可以归为制造问题的改革,我们在改革之前,一定要充分重估,一方面是评估,这种改革会制造多少问题,一种是这种改革会产生多少“将得利益者”。

利益受损者,并非既得利益者,但改革受益者,肯定是“将得利益者”,在“土改”面前,农民是“将得利益者”,因此土改进行得非常顺利,改革能否进行,不仅在于既得利益者有多大的阻碍,也在于“将得利益者”占多大比重。

在改革蓝图出来之前,既得利益者表现得比较活跃,而一旦改革蓝图确定了,“将得利益者”就会表现得非常活跃,为什么很多阻力很大的改革,进行起来反而出乎意料的快,进行因为有大批的“将得利益者”在推动,中国要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下层民众是“将得利益者”,是改革的动力,要抓住这一动力。

2030 中国创造人类福祉的奇迹

人类有文明史以来,“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要么是哲学家和诗人美妙的幻想,要么是政客漂亮的说辞,而真实的社会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家欢乐几家愁”,人与人之间因为出身、地域、阶层的不同,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人类正在由“大趋异时代”进入“大趋同时代”。

谈中国,就不得不提世界,我们也只有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世情,才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国情;才敏锐地、前瞻地识别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才能够更加主动地创造战略机遇期。

那么当代的世情是怎么样的呢?近二百年世界经济增长历史几乎就是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大趋异时代”。而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持续经济高速增长,会大大地促使,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从两个世纪的“大趋异时代”转向21世纪的“大趋同时代”。

而这种“大趋同”时代的到来主要是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结果,是知识全球化和当地政治、经济、教育的推动。

世界正处于第三次黄金增长长期

人类之所有会出现“大趋异时代”向“大趋同时代”的转变,这是因为世界存在第三次黄金增长长期,从大趋势来看,进入19世纪以后,世界先后经历了两次黄金增长长期。所谓黄金增长长期,就是连续的、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一般可持续10年到50年。第一次是在1870—1913年间,以电气革命和铁路革命为特征,美国和西欧国家都是这次黄金增长长期的领导国;第二次是在1950—1973年间。从1990年至2030年,全球经济正处于第三次黄金增长长期。

从1990年起,到2030年,全球经济有望保持30%-35%的年均增长速度。新一轮发展黄金时期参与的国家数和地区数目之多、人口规模之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之深,都是前两次黄金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亿-70亿人口都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形成超长时期、超大规模高速成长时期。

在本轮全球黄金增长周期中,全球经济版图将发生重大变化,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将出现大逆转,不仅中国、印度在2030年回到1820年的水平,整个南方国家也将回到1820年的水平,是一个典型的“U”字形。这一趋势是世界的主流,是世界的基本趋

『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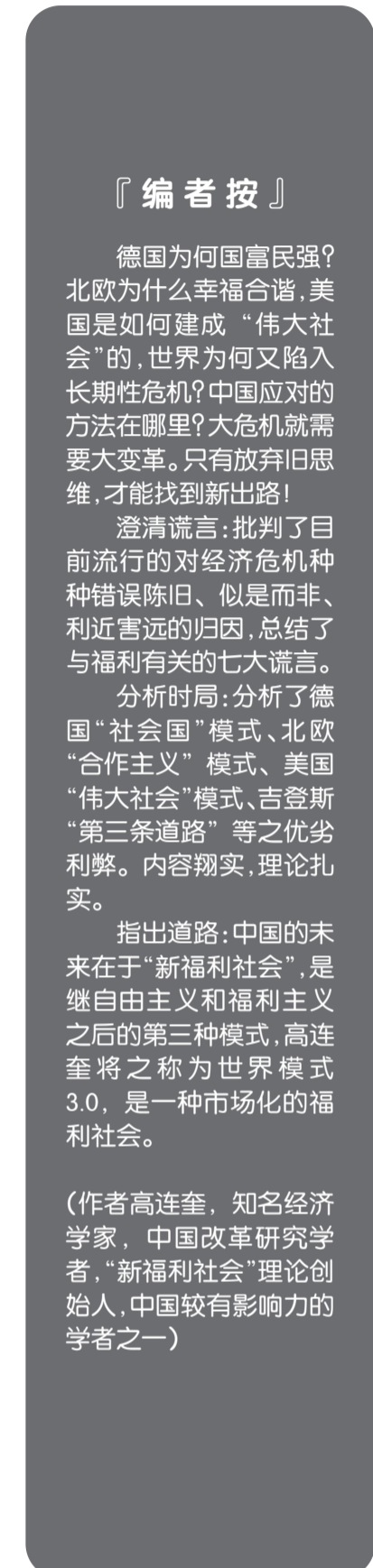
德国为何富民强? 北欧为什么幸福和谐, 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 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 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 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只有放弃旧思维, 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 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 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 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 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 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 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 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3.0, 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 知名经济学家, 中国改革研究学者, “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 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和知识化的加速, 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 基础设施现代化加速, 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国, 国际化的加速, 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将来还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 世界最大的贸易服务国。这“五大引擎”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相互需求、相互促进, 我们完全可以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抱有很强的自信心。

另外重新塑造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中国经济地理, 也将成为中国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未来中国将形成“两横三纵”的城市群格局: 以欧亚大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 以沿海从大连到湛江、(北京)哈尔滨(北京)广州、(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昆明通道为三条纵轴, 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市区为主要支撑, 以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这可能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大城市规模最多、到时候中国经济地理将会大变迁。

到2030年,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形成世界最大的现代产业体系,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群, 以及建设世界最大、最现代的基础设施体系。我们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 中国的对外投资既是中国的海外利益, 也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巨大商业机会。将来可能会出现中国GDP超过GDP的情况, 世界投资中国的时代还将继续下去, 而中国投资世界的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发展经验

中国的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 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 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划的。

中国的发展是三种趋势的结合: 一是自然发展趋势, 二是宏观规划指导下的市场驱动, 三是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引导。自然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体自发行为的结果, 市场驱动是在国家规划指导下的企业自主投资、自主决策的过程。它受到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激励, 激发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而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 加速了国家预期目标的实现。

国家发展战略引导是政府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公共力量, 来影响实际的发展趋势, 推动其加快发展, 或者限制其发展趋势, 它反映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在国际规划中, 规划引导值的确定一方面要充分体现政治意愿的强烈程度, 另一方面也要以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汲取能力、动员能力和配置能力为基础。上述三重趋势也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发展优势与制度优势。

从发展优势来看, 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巨大规模效益优势, 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具有较长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具有保持高速发展的惯性和趋势。

“共富”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

近代, 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瓜分, 急剧衰败, 但中国人并没有泯灭伟大梦想, 康有为再次重申并发展了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而只是“升平世”, “升平世”之后还有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即实现了人类大同的“太平世”, 可见共富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

另外实现“共富”, 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1979年之后, 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的“中国梦”, 也提出了从“先富”到“共富”的两步走方针。这里面构建“共富社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 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延伸, 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社会主义在中国本身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不成熟、极不发达, 80年代不发达两大阶段, 至今才形成了比较适应、比较成熟、比较成功的阶段, 但还不完善、还不均衡、还不平等, 今后还要走向更为成熟、更加均衡、更加公平的阶段。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 才能真正凝聚十几亿人民, 有效动员社会各种力量, 充分激发人民的创造力, 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社会主义因素不仅使人们更快地富裕起来, 而且使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其实当代中国北京、上海或大连的现代部分, 已经比富裕的美国要先进”,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再过20多年, 中国“后来居上, 理所当然”, 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以更小的沉没成本, 更先进的技术, 更高效的组织能力, 全面超越美国。2030年的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现代经济强国。伟大的国家有伟大的梦想, 伟大的时代有伟大的梦想, 当代中国正经历空前广泛的经济、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 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已经汇合为时代主流。再二十多年的发展, 中国不仅将创造世界经济的奇迹, 也将创造人类福祉的奇迹。

研究中国要用“大经济观”

当代中国经济为什么总是存在那么多的分歧, 关键还是“经济观”的不同, 其实任何说得都有几分道理, 但仅凭那几分道理, 就想指点江山, 左右政府, 那是肯定不行的。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缺乏一种“大经济观”, 这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分歧比较多的一个核心原因所在。

当然笔者所说的这种大经济观是指的“现实世界的经济学”, 而非“理论世界的经济学”, 理论世界的经济学, 越趋越好, 无论多么偏激都可以允许其存在, 但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却远非如此, 特别是为国家建言的经济学更应该慎之又慎, 一个小小的经济政策错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灾难, 因此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就必须拥有“大经济观”, 所谓“大经济观”就是从大处着眼, 从大处落笔, 即使是微观政策也必须考虑其效用放大之后影响。

笔者认为, 研究大经济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有历史的深度, 二要研究综合条件, 三要有前瞻性而不是只顾眼前, 四不能摇摆于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 六摆脱某一学派的限制, 综合运用各个学派, 七不能只为一个利益集团说话, 八既要考虑经济效率的提高也要兼顾民生的改善, 九经济高速增长与风险控制并重。

笔者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拉美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这些国家之所以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 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图一时经济之增长, 引入了过多的外资, 最后各种产业都被外资控制, 成为切切实实的经济殖民地。这就是只顾眼前, 缺乏前瞻性。

比如在很多学者的眼里, 失业、人权、福利都无所谓, 只要经济增长就好, 但对于个体来说, 不用说半年的失业, 即使是一两个月的失业都是灾难性的影响, 而这些基本上没有纳入很多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低人权、低福利、破坏环境的经济增长, 本身就违背了经济增长的目的, 这就是只考虑经济效率的提高, 而没有考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改善民生。

比如在美国, 经济学谬论邪说层出不穷, 而这些谬论邪说的出现, 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某一政党的经济政策做论证时出现的, 比如著名的减税不会造成税收减少的理论, 比如减税会让富人承担更多税收的理论, 都是美国共和党的御用经济学家宣扬的歪理邪说, 减税是不会造成税收绝对值的减少, 但会造成税收在国民产出中的占比下降, 最后只能是赤字经济, 另外减税确实使富人在税收中承担的比例更大了, 但富人的纳税绝对值却小了, 富人税收与自己占有财富的比例也降低了, 这些御用经济学家话只说一半, 无非是对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进行诱骗而已。这就是经济学家只利益集团说话。

笔者提倡“大经济”观, 其实只希望能够使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氛围有所改观, 但这其实很难, 首先这种大经济观对那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没有作用的, 对那些民粹领袖也是没有作用的, 对西方多党分赃制下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政客也是没有用的, 对那些根本就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经济学的人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只可能为特别利益群体充当经济打手, 而那些民粹领袖也只利用民众的无知对民众进行可耻的诱骗, 而在那些多党分赃制下的政客眼里, 自己的政治前途远比国家利益重要得多。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对经济学各个派别的理论缺乏了解, 他们强调什么, 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 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因此要用“大经济观”来分析中国问题也只能寄希望于那些真正进行学术研究的学人了。

另外媒体对经济理论的选择作用也不可小视, 学术界并不缺乏良知学者, 也不缺乏严谨科学的理论, 但这些理论和学者往往要经过媒体的选择才能与公众见面, 而在这里面, 媒体人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微妙的。

研究中国如何才能避免偏激

如果说缺乏“大经济观”是专业学者常犯的错误, 那避免思想偏激, 则是对普通读者, 或是民间思想者的建议。

民间思想爱好者, 他们在舆论界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知名学者小, 特别是在博客、微博等“自媒体”比较发达的年代。

偏激就是只强调一方面的道理, 而不顾整体利益, 或是只强调小众需求, 而不顾大众想法, 偏激学问的形成大多跟知识体系的不完善有关系。如果研究历史, 或是研究文化, 很容易成为反体制的人, 而如果研究财经或国际关系, 就很容易成为民族主义者, 而要综合研究, 才能真正看清当代世界的全貌。

(待续)